

## 友谊政治与危机时间 ——论凯莉·雷查德的“俄勒冈”电影及改编

但汉松

**内容提要：**美国独立电影导演凯莉·雷查德的近作《第一头牛》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与西部拓荒的寓言故事，呼应了她之前多部“俄勒冈”电影的主题：友谊与危机。通过借用巴里巴尔对三种政治的区分，以及霍耐特等人关于承认的观点，本文将她电影中独特的友谊叙事置于历史与当代危机的语境中，考察她如何表现友谊政治在当下的潜能与限度。同时，通过对照雷蒙德的小说原著，进一步解读出危机的本质在于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提供一种真正的未来性。电影与小说作为具有审美性的政治文本，不仅能够介入对当前危机时间的批判中，而且可以提供超越身份认同的友谊叙事，并以此作为框架去想象一种替代性的承认政治。

**关键词：**友谊 危机 雷查德 俄勒冈电影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2)06-013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文学经典建构的跨媒介性研究”(21BWW03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DOI:10.16430/j.cnki.fl.2022.06.008

**Title:**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and the Temporality of Crisis: On Kelly Reichardt's "Oregon" Films and Adaptations

**Abstract:** *First Cow*, a recent film allegorically capturing capitalism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West, echoes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Kelly Reichardt's preoccupation with friendship and crisis. By invoking Balibar's three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Honneth's notion of recognition, this essay positions Reichardt's distinctive friendship narrative 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rises, and brings to fore how she represents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in terms of its potentiality and finitude. Also,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film with its original novel, Jon Raymond's *The Half-Life*, arguing that the essence of our crises lies in the failure of global capitalism to bring about an authentic futurity. Not only can films and novels — aesthetic texts with a measure of political agency — engage in the current critique of the temporality of crisis, but the two artistic genres can provide us with a friendship narrative transcending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and with a vision of alternativ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Keywords:** Friendship, crisis, Kelly Reichardt, "Oregon" films

**Author:** Dan Hansong,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dhs@nju.edu.cn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美国独立电影女导演,雷查德(Kelly Reichardt)执导的大多数故事片均以俄勒冈为背景,甚至连制作团队也来自该州。她这份深厚的俄勒冈情结源于与俄勒冈小说家雷蒙德(Jon Raymond)十多年来深厚的文学友谊。自 2006 年的《昨日欢愉》(*Old Joy*)开始,两人先后合作了《温蒂和露西》(*Wendy and Lucy*, 2008)、《米克的近路》(*Meek's Cutoff*, 2010)、《第一头牛》(*First Cow*, 2019)和《好戏登场》(*Showing Up*, 2022)。雷蒙德不仅是这些电影的小说原著作者,而且深度参与了剧本创作。雷查德直言自己对雷蒙德所在的地方有“巨大的依恋感”,而《温蒂和露西》的取景地之一,就是作家创作这个故事时从公寓的窗户可以一眼望见的停车场(Fusco and Seymour 6)。她在访谈中甚至坦承,她无法想象自己拍电影时缺少雷蒙德,并说:“我感觉这是完美的搭配,他描写人物的内心,而我的挑战就是想办法将它具体转化为剧本”(qtd. in Murphy 159-60)。

与这份私人友谊相得益彰的,则是这些俄勒冈电影中贯穿始终的友谊主题:《昨日欢愉》讲述了波特兰两位昔日旧友的户外温泉之旅;《温蒂和露西》讲述的公路故事聚焦于一个女性流浪者和与她相依为命的狗;《米克的近路》是关于 1845 年“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上艰难行进的拓荒者家庭与印第安俘虏近乎不可能的他者友谊;《第一头牛》以 19 世纪的俄勒冈领地为背景,刻画了白人厨子和中国淘金客的生死之交。

雷查德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实践电影与小说的跨媒介友谊,又在她的俄勒冈电影里反复展演复杂的友谊故事,这或许并非巧合。事实上,作为左翼色彩浓厚的独立电影人,雷查德一直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她希望在这个经济危机和政治极化的时代,政治电影(political cinema)能恢复六七十年代美国影坛的那种荣光,用电影去“表达时代的焦虑、不平等和偏执症,同时具有令人兴奋的视听感受”(Reichardt et al. 15)。她的前期电影表达了对小布什政府和海外反恐战争的严重不满,以及对 90 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社会进步氛围的怀念,而《第一头牛》更是饱含了她对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尖锐讽刺。于是,摄影机里的俄勒冈成了美国神话与现实的提喻,她试图用电影去批判性介入 21 世纪美国、乃至全球的各种社会危机。笔者认为,雷查德的独特与可贵之处,在于其电影语言中充盈的危机意识和敏锐的资本主义批判,友谊作为重要的问题素(problematic),始终处于这些俄勒冈电影的前景,吸引我们去超越惯常的身份认同问题,思考友谊如何在危机时代实践“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本文接下来以《第一头牛》及其小说原著为主要分析案例,结合当下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诸多现实,进一步阐述友谊政治和危机时间的微妙关系,叩问小说与电影是否能够想象性地介入时代危机,并提出某种文学的解决方案。

### 蛮荒领地的友谊寓言

雷查德在《第一头牛》的开头,直白地表明了这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片头题词选用了布莱克《地狱的谏言》中的名句:“鸟儿有巢,蜘蛛有网,人类有友谊”(Raymond and Reichardt 1)。与这些文字相互印证的,是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骸发掘现场:两具年代久远的人体骷髅并排躺在泥土中,而且手骨搭扣在一起。不久,观众

获知了这堆骷髅的身份：死者分别是 19 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俄勒冈领地的白人厨子库奇(Cookie)和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卢金(King-Lu)。两人结缘于一次意外相逢，当时库奇追随一帮皮毛猎人在荒野中寻找边境贸易站，恰巧营救了被俄国人追杀的、衣不蔽体的卢金，两人由此结为“与子同袍”的莫逆之交。他们住在同一间棚屋，共同劳动和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分享各自的“美国梦”——库奇期待有朝一日能开面包店或餐馆，卢金则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农庄。但正如卢金所言，“最大的困难在于起步。穷人没有办法跨出第一步……你需要资本。或者，你需要某种奇迹”(30)。改变他们命运的，是俄勒冈领地的第一头牛，但并不是凭借**奇迹**，而是**犯罪**：他们晚上结伴去偷挤牛奶，然后利用库奇的烘焙技能，做成曲奇饼去街上售卖，结果在这片蛮荒之地大受欢迎。后来，偷奶的事情终于败露，两人被奶牛的主人、贸易站的首席代理商追杀，逃亡中身负重伤，最后牵手长眠在树林里。

虽然好莱坞西部片对男性情谊(bromance)的呈现并不鲜见，但雷查德女性视角下的这种男性友谊仍然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库奇与卢金的关系中虽然暗含同志情色的阐释空间，但性向身份的认同并不是电影的主题内核，从而使这部电影迥然有别于《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2005)或《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 2021)这样的作品。在雷查德慢节奏的极简主义镜头中，库奇无疑是带有阴柔气质的男性，他细腻而温柔，为张扬男子气概的皮毛猎人提供食物和照料。搬到卢金棚屋后，他立即开始打扫，将一束野花放入空瓶中，装饰两人共同的“家”；在屋外劈柴的卢金抱着木头进来，略带暧昧地夸赞这个简陋居所的焕然一新(27-28)。然而，由于《第一头牛》的核心冲突还是围绕“盗奶”和“卖饼”展开，雷查德并未着墨于两人的身体欲望，而是关注社会与自然环境对他们命运的倾轧。换言之，“我是谁”这个当代身份政治的流行命题并不是女导演关心的，男性个体的情欲史让位于资本主义前史，焦点则是无产者的友谊结盟是否能在新兴的自由市场——凭借畅销的创业产品“油蛋糕”(oily cake)——逆天改命。

另一方面，雷查德的友谊故事超越了性别/性向身份和族裔/民族身份，带有一种超文化(transcultural)的特征。库奇来自马里兰，但并不是典型的美国男性拓荒者，他自述父母双亡，一直四处漂泊谋生，认为自己没有故乡。而卢金虽然是中国人的，却说着流利的英语，而且在来到俄勒冈之前曾乘船到过伦敦和非洲，见过北回归线以南才能见到的南十字座(25)。显然，卢金不是作为典型的华人脸谱存在的，而是恰如影评人斯科特(A. O. Scott)所言，此人身上体现了一种“国际冒险”(cosmopolitan adventure)精神。两个文化身份看似迥异的异乡人却在俄勒冈结下了生死之谊，甚至依偎着同赴黄泉。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头牛》杀青后正好赶上新冠全球大流行，美国民间的排华暴力不断升级，同时又是特朗普政府全力打压中企、推动中美脱钩、制造新冷战氛围的敏感时间节点。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却看见中美友人生死相依、白骨相靠的动人画面，这无疑是雷查德给这个狭隘时代的一次辛辣反击。

那么，在暴力肆虐、相互倾轧的蛮荒俄勒冈，是什么让两个来自不同半球的男人实现了深厚的联结呢？斯科特指出，在 19 世纪美国作家笔下，这种联结可以被称为“天然的同情”(natural sympathy)，也可以叫作“爱”(Scott)。我认为，在这样一个资本主

义前史的政治—经济寓言中,库奇与卢金的友谊交往固然有心性与性格的造化,但最重要的仍是基于共同的无产者阶级地位。众所周知,俄勒冈在西部拓荒史上有着显赫地位,是美国建国后远征探查西部的终点。在电影中,卢金对蛮荒的俄勒冈领地发出了感慨:“历史还没有到达这里”(26)。不过,实际并非如此。18 世纪早期盛行于太平洋地区的海狸皮贸易既是俄勒冈自然史血淋淋的一页,也是北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缩影。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不仅几乎导致了北美大陆曾经生活的几千万只海狸几近灭绝,而且它以垄断贸易的方式系统性地压榨印第安人和库奇、卢金这样底层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俄勒冈领地以贸易站为单位的小型社会,首席代理商(Chief Factor)攫取了绝大多数财富,牢牢控制了贸易渠道。电影中,他住在当地仅有的一所大宅里,有佣人和警卫,由他买入俄勒冈的第一头奶牛既是个人财富的象征,也是资本主义“现金牛”(cash cow)的喻指。相反,库奇和卢金虽然胸怀企业家之梦,却苦于缺乏生产资料和创业本金,而只能挣扎在这个原本承诺了“美国梦”的边疆荒野的底层,过着近似原始的贫苦生活,甚至常为一双鞋子和几粒纽扣而操心。因此,盗挤首席代理商的奶牛并用作商业经营的原材料,不只是简单的盗窃行为,而是具有“非法侵占”资本家“现金牛”的象征意义。虽然“油蛋糕”成为两人初创企业的热销产品,获得了贸易站消费者的青睐(甚至连首席代理商也颇喜欢),显示了两人捕捉商机、理解市场的超凡能力,但恰恰因为其原始资本缺乏合法性,最后只能在事迹败露后仓皇出逃,并在抓捕中负伤身亡。

如果说物质的极度匮乏和梦想的无限充盈,构成了库奇和卢金的阶级友谊基础,那么这种“友爱”(philia)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于利益和快乐关系的友谊”,属于那种以友爱主体的美德为根基的友谊(汪民安 125)。诚然,两人关系中存在着利益互补的因素——夜晚,库奇偷挤牛奶,卢金在树上盯梢警戒;白天,库奇制作“油蛋糕”,卢金负责定价营销。不过,当两人短暂的商业伙伴关系因为偷奶被发现而走向破灭,当两人事实上已不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时,他们友谊的牢固性却并未受到影响。当库奇在逃亡中冒险返回两人昔日的棚屋时,意外发现了卢金就在附近等他,而且拿着他们共同赚来的钱,并未抛下对方独占这份财产。后来在结伴逃难时,卢金本有机会先行逃到码头乘船离开,但为了照顾受伤更重的库奇,他坚持停下来让朋友休息,并在一旁陪护放哨,直到二人都在筋疲力尽中溘然长逝。以死亡来作为友谊的终结,是友谊最刻骨铭心的经验时刻,恰如蒙田所说,“你走了,我的幸福,也随之破碎,我的兄弟/随着你,两人的灵魂一起葬入坟里”(转引自汪民安 131)。他们作为友谊主体的不可分割,说明这种关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和获取财富,而是为了共同实现赤贫阶层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以俄勒冈领地的贸易站为缩影,我们看到严重的垄断和社会分配不公如何固化阶级,无产者无法凭一己之力去谋取这种幸福,只能借助于友谊同盟的相互砥砺和守望相助。

这种根植于社会不公的友谊不是私人情感的神话,倒更像是雷查德对政治的寓言,或者说,友谊承载了友谊政治的实践。古典的友谊政治模式源自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前者将美德为基础的友爱作为公民交往的典范,从而引申为城邦的政治友爱;后者则以友谊模式作为律令,警告朋友间不可结党营私去颠覆和分裂共和国(汪民安 126-27)。友谊之所以对政治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既是选择性的,同时又可以超越宗

族、族裔、种族、性别,实现广泛而多样化的政治联结。古典的友谊政治学希望将公民政治与友谊相互结合,既希望有德性的友谊能训练出好的公民并由此促进政治,同时又希望避免坏的友谊(如裙带主义或恶人结盟)败坏政治(Digester 105-06)。这里,雷查德电影中的友谊叙事显然不是为了演绎古典的友谊政治模式,或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政体,而是指向了一种与危机密不可分政治变革。事实上,雷查德在俄勒冈电影中着眼的友谊总是与危机同行;或如迪杰瑟(P. E. Digester)所言,处于“去合法化的政治环境”中(xv)。友谊非但不是政治的工具,反而试图成为恶劣政治的替代选项,其存在的意义是激烈地质疑、挑战或修正当前政治框架中的压迫与不公正。正如电影中卢金给库奇推心置腹的激励,“[历史]即将来临,但我们早一步来到了这里。也许这次我们可以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创造它”(26)。

在论及黑暗时代的友谊与人性时,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动人地写道:“往往越是在‘黑暗时代’,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中的人性体现得越显著……这种人性是弃民们的伟大特权;这种优势是全世界的弃民在任何情况下总能施予对方的”(13)。政治哲学家施克莱(Judith Shklar)也恰切地指出,政治黑暗时代的友谊让“朋友组成了私人政体,使之免受国家侵害,并构建一个另类的道德宇宙。在这里,自由和自发性居于统治地位;而在外面的大社会,压迫与伪善则大行其道”(14)。某种意义上,库奇和卢金作为弃民在文明世界的边缘成功而短暂地建立了这样的“私人政体”。以那间林中棚屋为边界,俄勒冈领地这个暴力泛滥的法外之地得以生成了一个朋友间相互欣赏、慰藉、分享和信任的道德宇宙。

### 政治、承认与阶级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中的友谊政治,我们有必要调整一下坐标系,将它与当下流行的身份政治加以对照,以发现雷查德在何种意义上偏离了文化政治惯常的议题设置,并讨论她这样做的意义。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重新认识在这个时代到底何为“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写过一篇文章,叫《政治的三种概念》,提到政治的三种概念性:其一是解放(émancipation);其二是变革(transformation);其三是礼貌(civility; 1-2)。解放政治的出发点是对普适权利的绝对认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解放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但最终不是让无产阶级变为有产阶级,而是彻底消除阶级本身。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强调政治的他律,尤其是环境、历史和社会的外在作用,因为“对马克思来说,除非处于确定的条件之下,否则不存在典型的政治(或‘历史的生成’)”(9)。巴里巴尔进一步指出,当代政治概念仅仅讲“解放”与“变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将“礼貌”纳入其中,它既是指公民生活中的礼貌状态,也是指良性的他者伦理和身份政治图景。这意味着在异质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既要承认法律权利的平等,还要与他者建立一种适宜的情感和伦理立场,这不仅是对他者的彬彬有礼或宽以待人,更包括自我对他者的欣赏和承认。

与“解放”和“变革”的政治不同,“礼貌”的政治不指向某个革命性的崭新未来,而是将日常生活的“同一性暴力(violence of identity)本身作为政治的目标”(Balibar 23)。

巴里巴尔不认同古典自由主义所笃信的独立主体,而是认为“一切身份本质上都是超个体(transindividual)的”。这也意味着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个体,每个人都必须属于更大的群集;同一性不是既有之物,而总是“一个不均的、未完结的危险建构过程的产物”(27)。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生成的身份/同一性观念,巴里巴尔将礼貌政治视为另两种政治概念的重要补充。如果说后两者指向激进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变革,那么前者则是酝酿这种变革所需要的公民生活基础,只有凭借它才能排除我们这个时代的极端暴力,从而“为政治(解放,转换)创造一个(公共的、私人的)空间”(30)。巴里巴尔关于礼貌政治的论述,可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建构,通过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福柯的生命政治)和当代身份政治有机地整合起来,达到两者的相互补充。

如是观之,友谊政治可以归入礼貌政治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友谊政治是身份政治的支流。事实上,正是因为当下身份政治的深刻局限性,我们才需要以友谊政治或礼貌政治作为某种解毒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近著《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写道:“当今左派的问题在于,它越来越选择支持某些特定身份。它不再团结工人阶级、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等广大团体,而是团结那些以特定方式被边缘化的更小的群体。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有关现代自由主义命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基于普遍与平等原则的承认变异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别承认”(89)。诚然,在讲求政治正确的大气氛下关注少数族裔、少数性向或边缘移民,这是西方左翼正义的社会诉求,本身没有问题。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满于身份政治相对狭窄的议题设置,因为它会遮蔽更为重要的东西,譬如处境日益艰难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而后者属于“历史更悠久、更大的群体”(89)。巴里巴尔的洞见在于,三种政治概念应该彼此关联、密不可分:解放政治的愿景离不开变革政治的在地化实践,而这种实践也离不开日常生活中基于礼貌构建的公共和私人空间,反之亦然。显然,巴里巴尔的折中主义是对当下西方身份政治的一种批评。近年来,西方左翼普遍关注的议题局限于狭窄的身份政治,仿佛少数群体在文化表征上的平等性是唯一重要的社会议题,选择性无视资本主义体制所造成的更为普遍的、系统性的阶级分配不公、向下流动性加剧等问题,从而愈发远离解放与变革政治中吁求的激进性。

无论是当代美国电影还是小说,基于肤色、性别与性向的身份政治已然是文学再现的主流。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气下,雷查德这样的导演才显得十分独特,因为她关注的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洪流中挣扎漂泊的“流众”(Precariat),他们之间的友谊联结往往是基于弱势阶级地位带来的相似的生活经验。雷查德的这种主题偏好与其新新现实主义(neo-neorealism)的电影风格不无关联。她不满于好莱坞电影中“将个体之间的冲突塑造为社会政治问题”的趋势,因为这种趋势其实折射出了当代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单纯看法,即“结构性的、弥漫的危机状态”可归结于“个人选择和政治表达”(Fusco and Seymour 12)。从《昨日欢愉》开始,雷查德的电影就对塑造个人的独特性并无兴趣,个人的私密过去(譬如创伤记忆、失去的恋情或家庭史)不再是主人公当下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最重要的戏剧冲突往往源自人类最迫切、最一般的需求,它们往往只是食物(《第一头牛》)、水(《米克的近路》)、交通工具或遮风挡雨之所(《昨日欢愉》

和《温蒂和露西》；15）。因此，雷查德承认自己深受20世纪60年代“厨槽现实主义”（kitchen sink realism）电影的影响（Van Sant and Reichardt 78）。这些“俄勒冈”电影并非直接表达政治观点，而是通过刻画一段段友谊关系中普通人“共同在世”的日常疾苦，引领观众去关注这些阶级悲苦背后更深层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成因。

作为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霍耐特（Axel Honneth）也强调阶级，但其政治概念观比巴里巴尔更简洁，将当下西方社会的政治使命提炼为“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众所周知，“承认”的概念来自青年时代的黑格尔，黑格尔把围绕承认展开的斗争解释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说法农（Frantz Fanon）日后将承认的斗争解释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发生的事件，那么霍耐特所言承认则主要关乎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霍耐特并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阶级”一词，而是对它做了重要的改造。这里，阶级既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指向一种共同的情感结构。霍耐特进而将资本主义商品交易制度下造成的人的物化解释为“承认的遗忘”（forgetting of recognition）或“错误的承认”（misrecognition）。在一个由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定义的时代，无论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或是流众，这些群体的成员总是强烈感知到社会的不公，并由此产生愤懑和怨恨（或者尼采所说的 *ressentiment*）。霍耐特强调，分配不公从来不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经济与生产关系问题，它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平原则和个人自我价值的冒犯”（Felski 99）。此外，当霍耐特讨论“承认的斗争”时，他指的是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而友谊关系在这种相互承认的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它让自我在与他者的交往中相互肯定和欣赏，提供情感层面的支持，从而得以确认为个体化的、自治的主体（Honneth 129）。

在当下的思想语境下，霍耐特的立场是耐人寻味的：他既希望关注目前被严重遮蔽的社会分配不公，也要求在文化再现的层面让弱势阶级获得肯定、承认、激赏。与巴里巴尔一样，霍耐特同样是折中主义的立场，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性，同时又向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加特（Richard Hogart）和汤普森（E. P. Thompson）学习，关注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 Felski 97）。不难想见，霍耐特这种伦理取向的社会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与雷查德的“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审美政治有颇多共鸣之处，两者都希望能让思想与艺术介入当前西方的危机中——重新抬头的民粹主义、过度讲究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式微的多元文化主义、非法移民与恐怖主义等问题。然而，无论是巴里巴尔的“礼貌”，还是霍耐特的“承认”，果真可以为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一套处理阶级与承认的思想方案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霍耐特就此有过一次精彩的辩论。弗雷泽同意霍耐特的前提，即讨论“承认”与“阶级”在当下至关重要，但是“承认”不能替代再分配（redistribution）。弗雷泽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霍耐特和泰勒（Charles Taylor）一样都将承认的价值放在了“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这个筹码上（Fraser and Honneth 28）。按照弗洛姆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是人最高级的心理需求，但是如果将承认的标准绑定在被承认者的自我实现上，那就势必把承认从道德问题变成了伦理问题。如果说道德问题通常是有答案的，那么在多元文化社会，伦理问题通常没有、也不应该有唯一的、

统一的答案。换言之,如何衡量人的自我实现与否?每个人理想中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因文化和时代而异,弗雷泽警告说,如果一味追求这样的“善”,就会掉进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陷阱,将错误承认的问题变成了心理维度的主体意识,那么在社会实操层面就很难真正实现这种承认的政治了(31)。弗雷泽据此认为,承认不能取代再分配,社会不应该、也没办法满足所有个体对尊严、平等、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在顶层制度层面谋求一种“正义”设计,从而确保社会大多数人的平等公正的参与(participatory parity)。

弗雷泽从正义实现的制度出发,将“错误的承认”放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有意回避心理化的讨论,这或许具有更好的现实操作性。然而,在反驳霍耐特的心理主义倾向时,弗雷泽似乎回避了一点:小说和电影等艺术媒介正是以处理个体的自我实现问题见长,从而成为制度立法和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巴里巴尔、弗雷泽和霍耐特基本都不提文学与艺术,但承认的政治不应该忽视主体的私人情感,不应该把承认仅仅界定为一种公共需求,它必须也完全可以在主体意识内部署和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的友谊叙事在危机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以一对一的共生形式,在友人主体间关系中实践、再现和反思承认。友谊关系中的这种“承认”不局限于礼貌原则(如相互尊重和包容),还涉及更深层的情感、动机和欲望的体认与激赏。《昨日欢愉》中库尔特在篝火旁向马克讲述自己的宇宙神秘主义哲学,《第一头牛》中库奇和卢金在木屋里对共同未来的畅想,就是这种“礼貌”和“承认”的绝佳文学例证。同时,文学中的承认不局限于文本之内,也发生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文学批评家莫伊(Toril Moi)从卡维尔(Stanley Cavell)那里发展了另一个承认(acknowledgement)的概念,并将文学阅读的过程描述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谋求相互承认的行动。与霍耐特的承认(recognition)类似,莫伊所讲的承认 acknowledgement 不是去简单地在他者身上寻找认同、喜欢或欣赏,而是一种对自我关系的揭示,即“我们将自己当成谁,我们如何想象自己与他者的关系”(207)。阅读的过程,就是回应文学对我们“承认”的主张,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止于认识论的操演,而是不断反求诸己、自我揭示,并在可疑的自我边界上向他者发出伦理与道德之问(208)。当然,不是所有的承认(acknowledgement / recognition)都会产生友谊,但正如雷查德在电影中展现的那样,一切友谊的核心必然蕴含着相互承认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失败将直接导致友谊的破裂。

这里,菲尔斯基(Rita Felski)对文学及文学批评在承认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一段绝佳的申辩。她认为,在承认和阶级变得格外重要的今时今日,文学作品以其复杂而多样化的再现方式,揭橥了承认的斗争可能包含的丰富阐释潜能;文学具有操演性,它不只是“描绘”(portray)承认的斗争,它本身就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上演”(enact)承认的斗争(102)。简言之,文学中的友谊叙事具有丰富的内在性,普通读者对文学的阅读和阐释,以及对文学伦理的复杂操演,所有这些能让承认成为一种情感的行动、认知的对象。当雷查德的电影总是充满余味地停下来时,故事往往都没有终结,关于友谊本质的追问才刚刚开启。她以开放式的结尾,邀请读者或观众加入这种不断生成的承认过程中;当她不断引领我们进入那些色彩斑驳的友谊故事时,正是在让我们感知



到这种承认的潜能、回报、限度或风险。

### 危机时间与友谊的限度

至此,本文似乎以乐观的笔调描述了友谊叙事与危机时代的关系:危机时代的核心问题是阶级区隔造成的分配不公,这种不正义唤出文学艺术以阶级贱民们的友谊叙事作为一种微型政体,去实践更具社会伦理意涵的承认政治。然而,雷查德的俄勒冈电影又总是充满了悲剧意味——要么友谊的承认基础在内部逐渐被现实的影响瓦解(如《昨日欢愉》),要么友爱的双方在绝境中以共同的死亡走向终结(如《第一头牛》)。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雷查德镜头中如此真挚动人的友谊实践总在环境的扼杀下走向败局?这种终结的意义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理想型友谊的脆弱,是否又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反思了黑暗时代的危机本质呢?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跨媒介的视角。如果比较一下小说原著《半条命》,我们发现小说家雷蒙德其实设计了远比电影更复杂的时间线。书中的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年,故事遍及俄勒冈、太平洋和广州。《第一头牛》仅用了其中一条时间线,完全省略了平行展开的当代故事线,里面讲述了一对青少年女性的友谊。雷蒙德在访谈中坦言,两人合作改编《半条命》是长久的夙愿,但这部小说“范围过于广阔……我们没有资源让故事中那些人物跨越大洋,像书中写的那样去往中国”(Smith)。为了节约制片成本,雷查德将原著大幅压缩,把库奇生命中前后出现的两个伙伴(分别是美国人亨利和中国人卢金)合二为一,取消了库奇和亨利航行去广州倒卖海狸油的部分,将故事完全限制于俄勒冈领地。相较之下,小说家针对库奇和亨利的创业故事开了一个更大的脑洞:在亨利的建议下,他们打算将海狸油作为中药材卖到万里之外的中国。然而,亨利看似精明的商业创意遇到了清朝朝贡制度的铜墙铁壁。在试图绕过广州洋行买办去打通关节走私时,库奇锒铛入狱,亨利无力营救,只得独自回国。库奇在广州关押了几十年,与落难的书法家卢金成为狱中好友。获得清朝大赦后,这对已近暮年的难友启程去波特兰寻找新的生活,原本以为能够归隐山林,结果陷入波特兰排华暴力,他们和几十个中国矿工一起,被当地种族主义者屠杀。

表面上看,雷蒙德颇具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雷查德的电影改编中,由于制作经费不足,必然要做减法,但实际上小说与电影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场景范围和故事丰富度,而在于两人借由各自媒介所传递的不同的危机时间,以及友谊在这种时间中的命运。《第一头牛》中以牛为喻体,寓言式再现了首席代理商作为垄断者、牛作为稀缺生产资料、皮毛猎人和印第安人作为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然而,尽管电影中围绕奶牛展开的殖民地微型甜品店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某种提喻,却不能与小说原著中全景式铺陈的19世纪全球化殖民贸易同日而语,毕竟后者才是我们当下危机的重要源头。同时,在《半条命》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俄勒冈历史上残酷的海狸皮贸易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还将友谊的终结放置在排华暴力的语境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蒙德结尾所写的事件乃是基于历史上真实的“深溪”(Deep Creek)大屠杀。1887年5月,在俄勒冈蛇河附近的地狱谷,34名华人矿工遭到白人暴徒的袭击并惨遭杀害,而这个

事件又是俄勒冈政客戴迪(Matthew Deady)在 1857 年鼓吹“纯白人的联合体”、并在 1872 年制造《排华法案》的延续(Lamar 882)。小说家从历史失忆中寻回这段真实而沉重的俄勒冈历史,让当代读者意识到这个西部拓荒者眼中的“伊甸园”曾经陷入怎样的种族主义狂热,以及这段往事与当前美国频发的仇华暴力之间潜在的勾连。

所以,尽管雷蒙德的小说与雷查德的电影都是关于俄勒冈领地的友谊故事,但前者呈现了更为绵密深远的、更具批判现实主义的危机时间,这是一个技术与风格的问题,但更关乎深层的时间意识和对危机主题的表达。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尖锐地指出,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愈发丧失与历史的真实联结,这种文化将“未来性进行批发清算(wholesale liquidation)”,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无力去为资本主义的命运“拟定迫近的替代选项”(794)。蒂尔(Peter Thiel)也有类似的担心,他指出我们当下被给予的只有“一种虚假的未来,一种没有未来性的未来……‘在这种奇怪的未来里,今天的趋势只会继续’”(qtd. in Nilges 3)。正是有感于此,尼尔格斯(Mathias Nilges)在讨论当代小说的整体面貌时提出一个观点:时间性是当代全球危机的核心,反常的是我们处于一种“永恒”的当下之中,因此处理时间性成了 21 世纪小说的重要使命(3)。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泛滥的投机资本和疯狂的次贷杠杆交易,其本质是风险资本主义的未来性危机,并继而延伸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普遍危机。《昨日欢愉》的结尾,库尔特和马克都悲哀地意识到,看似拉近二人距离的森林温泉之旅并不能真正修复其友谊关系,电影只能含混地停留在无以为家的马克在城市路口的彷徨之时;同样,库奇和卢金在《第一头牛》中充满诗意的携手死亡,让观众得以避免去想象他们命运多舛的前途。显然,雷查德电影中的友谊关系缺乏具有未来性的“当下”,而这也正是詹明信和蒂尔等人所批判的文化症候的体现。

雷蒙德小说中的友谊当然也是脆弱的(它们同样以死亡作为终结),但是《半条命》以并置的时间线和不同时代的友谊,试图突破那种“永恒当下”的幻视,去重新想象我们时代的未来性危机,这成为辨析其小说与电影改编殊异之处的关键。关于雷蒙德对时间性的处理,这里举两个关键方面加以佐证。其一,在《第一头牛》中,库奇和卢金试图盗用资本家的奶牛来创业,这种冒险当然也指向了一个奇迹性的未来(如白手起家开餐厅和旅馆),但终究是美国梦的翻版。而在小说中,创业方案是将那些被皮毛猎人剥掉皮的海狸尸体变废为宝,将其腺体熬制成海狸香(castoreum)卖到遥远的中国市场。显然,两种创业模式的商业逻辑有着显著不同,亨利在小说中向友人描绘的版本更具可持续性,蕴藏了殖民主义三角贸易之外某种生态主义的未来想象。在雷蒙德笔下,“中国”不只是海外市场的代称,而是另一种非西方的时间性。正如亨利所言,之所以在西方人眼里一钱不值的海狸油在中国却是珍贵的中药材,乃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崇拜现代医学……他们知道植物、动物、矿物和药草有这样的力量……他们那里的传统,西方人都闻所未闻,比古罗马的大教堂还古老”(86)。一言以蔽之,中国的魅力在于其古老的时间性,它“就像是美国之新的反面”(136)。如果说亨利对中国的这种他者想象充满了简单化的误读,那么在广州身陷囹圄的库奇却更深入地习得了东方文化中深层的时间性。他在狱中观察卢金写毛笔字,起初那些墨色笔画是“眼前的抽象之物,如

同一群蝴蝶在纸上投下的阴影”，但“渐渐地库奇开始理解汉语的结构。他认识了实词与虚词，具体和抽象。他自己的语言是一个封闭形式的集合，但汉语不同，它是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在自身基础上扩展和建构”（287）。凭借这种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体认，库奇感到自己与卢金的落难之谊也得到了升华，他在这种书法里“看到了一种悲伤，一种无法被克服的距离，某种无法被修复的破碎”（288）。中国书法历来有“字如其人”的说法，通过这种象形文字的书写，及这种语言系统背后的时间观念，两人得以实现跨文化友谊的承认。雷蒙德的友谊中承认的再现，显然比电影版本具有更复杂多元的时间意识。

其二，在基本被电影省略的当代情节线中，两个少女（蒂娜和特里克茜）的友谊表征了另一种对未来性的协商，与库奇、亨利和卢金的友谊故事构成了重要的互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女孩相识的时间与地点：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俄勒冈林地中的一处嬉皮公社。蒂娜从洛杉矶搬到这里，直接原因是母亲被炒鱿鱼，只能来投奔60年代的旧友尼尔。此处，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罗纳德·里根的能源政策带来的失业，以及激增的加州房租”（57）。蒂娜的母亲曾是标准的60年代左翼青年，主张环保和清洁能源，反对核武器，痛恨里根政府和其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不难想象，蒂娜在这个破败的公社所遭遇的不仅是另类的生活组织方式，而且是一种行将消亡的乌托邦想象。正是有感于此，蒂娜来到这里后开始怀疑：“历史，是发生在缥缈远方的东西”（29）。蒂娜和特里克茜结为好友后，开始偷偷合作拍摄一部独立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19世纪的费城医生如何利用前额脑叶切除手术（lobotomy）来修复爱人的精神问题。因为缺乏经费，特里克茜试图在公社秘密种植大麻，并用制毒的收入来购买摄影机。同时，在这样一个曾经实践过激进未来性的嬉皮公社，尼尔意外发现了库奇和卢金的遗骨，并在当地引发遗骨归属的争议。小说家的这种写法不仅让不同时空的友谊得以交汇，而且暗示了某种宿命的循环——19世纪的无产流民以友谊为舟，在全球颠沛流离，他们的梦想最终被这片土地的偏狭暴力所绞杀；同样，左翼青年的“反文化”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走向了衰败，他们及后代构建的友谊共同体始终无法真正抵抗资本主义的收编。在小说结尾，蒂娜和特里克茜充满现代性批判锋芒的电影计划最终被坚硬的现实打败，就像二十多年前她们的父母和一百多年前库奇和朋友们的“天鹅挽歌”一样。

将雷蒙德的小说原著与《第一头牛》进行比较，并非为了贬低电影，抬高小说。事实上，两者只是同一个友谊故事在不同再现媒介的分身，析出它们之间的形式差异，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学的整体性，以进一步揭橥友谊政治在危机时代的时间性宿命。雷查德曾告诉另一位导演，她电影中的友谊故事是关于“友谊的腐朽”（Van Sant and Reichardt 77），因为这个暴力而冷漠的时代必然让友谊政治陷入无力与徒劳。既然如此，在文学和电影中反复言说这种失败的友谊，还有意义吗？当代哲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凭借友谊我们可以承认和分享人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164）。然而，现代性的后果“不是制造出对承认的需要，而是寻求承认却不得的境况”（Taylor 35）。雷查德，以及她的文学伙伴雷蒙德以一种看似消极和否定性的友谊叙事，为我们时代严峻动荡的境况提供了一份证词——历史危机中的友谊越是脆弱易毁，越证明了人的相互承认是多么弥足珍贵。□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rendt, Hannah.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1968.
- Balibar, Étienne.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Trans. Christine Jones et al. New York: Verso, 2002.
- Digeser, P. E. *Friendship Reconsidered: What It Means and How It Matters to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6.
- Felski, Rita. "Recognizing Class." *New Literary History* 52.1 (2021): 95-117.
- Fraser, Nancy,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Trans. Joel Golb et al. New York: Verso, 2003.
- Fusco, Katherine, and Nicole Seymour. *Kelly Reichardt*. Chicago: U of Illinois P, 2017.
- Honneth, Axel.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Trans. Joel Anderson. Cambridge: MIT, 1995.
- Jameson, Fredric. "The End of Temporality." *Critical Inquiry* 29 (2003): 695-718.
- Lamar, Howard R., ed. *The Reader's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Harper, 1977.
- MacIntyre, Alasdair.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 Moi, Toril. *Revolution of the Ordinary: Literary Studies after Wittgenstein, Austin and Cavel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8.
- Murphy J. J. "A similar Sense of Tim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Writer Jon Raymond and Director Kelly Reichardt in *Old Joy* and *Wendy and Lucy*." *Analysing the Screenplay*. Ed. Jill Nels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158-74.
- Nilges, Mathias. *How to Read a Moment: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Crisis of the Presen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2021.
- Raymond, Jon. *The Half-Life*. New York: Bloomsbury, 2004.
- Raymond, Jon, and Kelly Reichardt. Screenplay of *First Cow*. *Deadline*. Web. 28 July 2022.
- Reichardt, Kelly, et al. "The Prospect for Political Cinema Today: A Critical Symposium." *Cinéaste* 37.1 (2011): 6-17.
- Scott, A. O. "'First Cow' Review: 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20.
- Shklar, Judith. "A Friendship." *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Ed. Stanley Hoffmann and Dennis Frank Thomps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8. 14-27.
- Smith, Orla. "Jon Raymond on Adapting His First Novel into *First Cow*." *seventh-row.com* July 25, 2020. Web. 28 July 2022.
- Taylor, Charles.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 Amy Gut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4. 25-74.
- Van Sant, Gus, and Kelly Reichardt. "Kelly Reichardt." *BOMB* 105 (2008): 76-81.
- 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rans. Liu Fa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2018.]
- 汪民安:《论友谊》,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2期,第120-34页。[Wang, Min'an. "On Friendship."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2): 120-34.]

责任编辑:马海良